

读思践悟

# 品苏轼风骨 悟检察担当

## 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有感

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 肖爽

最初了解苏轼是在中学课本里。那时，苏轼在我心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、词人。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对苏轼的了解逐渐加深，在阅读林语堂先生所著的《苏东坡传》之后，可以说我对苏轼的了解更加全面深入。书中，林先生评价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工程师，是假道学的反对派，是士大夫，是心肠慈悲的法官，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，是月下的漫步者，是生性诙谐、爱开玩笑的人。寥寥数语，将立体鲜活的苏轼形象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随着对苏轼传记与诗文的研读，他的爱民情结、法治素养、豁达心胸，逐渐成为滋养我成长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进士。他的一生，以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“乌台诗案”为重要转折，其诗词文风、人生境界均发生了显著变化。但无论是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无论仕途顺遂还是困顿潦倒，他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，始终未变。熙宁年间，王安石推行变法，苏轼结合民生实际，多次上奏朝廷，对变法中的偏颇之处予以纠正。例如，针对“青苗法”，他提出：“今陛下使农民举息，与商贾争利，岂理也哉，而何怪其不成乎？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政策实施中可能引发的民生隐患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苏轼调任密州知州，彼时密州遭遇严重蝗灾，当地官吏却粉饰太平，谎称“蝗不为灾”。苏轼怒斥谎报灾情的官员“将谁欺乎！”经过调查，他如实地报蝗灾情况，请求朝廷豁免当地赋税，并予以救济。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苏轼移知徐州，恰逢黄河决口，又遇连日大雨，水漫徐州城。一旦城墙崩塌，徐州城将被淹没。危急关头，苏轼身着雨衣，亲自上城筑堤防水，并劝阻富户不要弃城逃亡，以安民心。按照宋代律法，地方文官不得擅自调动军队，但抗洪形势迫在眉睫，苏轼亲赴军营，以诚动人，恳请官兵出城支

援。营首深受感动，应允全力抗洪。经历七十余日的奋战，洪水终于消退，徐州城得以保全。

苏轼精通《宋刑统》，深谙律法精髓，形成了“法宜宽仁、重赏轻罚”的思想。他在一篇策论中提出，在赏忠之时，宁失之宽厚，在罚罪之时，当惻然有哀怜之心，以免无辜而受戮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苏轼负责审理复核监狱在押犯，纠正错案、督办淹狱。多数官员或是敷衍了事，或是中饱私囊、收钱放人，苏轼却一丝不苟，每到一处，必仔细查看罪状文书，亲自点选囚犯询问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疑点。他向属县递交了长长的名单，凡是有冤情的、欠债难还的、因贫困偷取少量钱粮的，一律予以释放。在徐州任上，他发现狱中患病的囚犯常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，遂上奏《乞医疗病囚状》，认为“其以轻罪系而死者，与杀之何异？”并提出救治方法。

苏轼的一生，宠辱不惊、乐观豁达。《苏东坡传》中记载，章惇之子章援曾写信给已获赦北返的苏轼，请求宽宥其父。要知道，章惇拜相期间，曾将苏轼一贬再贬，从惠州直至儋州，可谓积怨颇深。但苏轼并未记恨，抱病给章援回信，写道“某与丞相相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增损也”，还寄去药物为其治病，展现了他的胸襟与宽容。

### 一位诗人带给检察人的启示

● 进入新时代，人民群众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日益提升，在办案中，如何从“以罚止罪”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，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。

●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应当高度重视当事人的申诉，在接待申诉和来访群众时，必须学会换位思考，认真对待群众诉求，耐心开展释法说理工作。

笔者从检三十多年，先后在多个检察院任职。初入职场时，在办案中总是“嫉恶如仇”，认为只要在法律框架内，就要对涉案人员从严处理。随着工作阅历的不断丰富，尤其是深入研读苏轼的作品、领悟其思想精髓后，笔者的司法理念逐步发生转变。进入新时代，人民群众在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日益提升，对于检察人而言，在办案中，如何从“以罚止罪”向注重源头治理转变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，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。

苏轼的为民情怀、担当意识、宽仁理念与豁达心胸令我敬仰，也为我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。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，多以小案为主，这就要求我们坚持“小案不小办、法理情相融”，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。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，检察人员必须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，在办案中敢于监督、善于监督。同时，严格按照“三个善于”要求，精准把握实质法律关系，深刻领悟法治精神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苏轼的“录囚”实践，也给我带来诸多启示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，应当高度重视当事人的申诉，不能简单认为案件办结、法院判决生效、罪犯服刑，检察机关的监督

职责就履行完毕。司法实践表明，有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当事人的不满，往往与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问题密切相关。针对此类情况，在接待申诉和来访群众时，必须学会换位思考，认真对待群众诉求，耐心开展释法说理工作。前些年，我院了解到一名服刑罪犯在改造期间表现不佳，频繁申诉，称刑期计算有误。检察官接到相关情况，仔细查阅全部案卷材料，多次与该罪犯谈话沟通，并前往原审法院核实相关事实，最终发现该罪犯已执行的四年刑期未依法折抵。经我院与原审法院沟通协调，原审法院依法重新计算并更正了该罪犯的刑期，切实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。

“大事难事看担当，逆境顺境看胸怀。”黄州的那场雨，将苏轼的豁达心境定格为永恒。被贬黄州期间，苏轼与友人出游，途中突逢大雨，众人皆因未带雨具而狼狈不堪，唯有苏轼从容淡定。雨过天晴后，他挥笔写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，道尽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从容，也成为苏轼精神最生动的注脚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份豁达与坚守，至今仍给我们以力量，指引我们从容面对人生的风雨与坎坷。



林语堂著《苏东坡传》

# 遇见更辽阔的自己

王丹



俯瞰安吉馒头山

于自己的节奏。我在一声声“借过”中向上攀爬，超越了一些人，也被一些人超越。在山野中，身份被卸下，人回到最本真的状态。这里没有“张总”“小

王”，只有一个个喘着粗气、咬牙向前的具体身影。风灌满速干衣，脚下是一条起伏的曲线，那一刻，我只专注于自己的脚步与呼吸。

冲过终点时，我的小腿僵硬如石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直到志愿者将奖牌挂上我的脖颈，报出“女子组第十名”时，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才席卷而来。我一个新手，竟也完成了这样一场跋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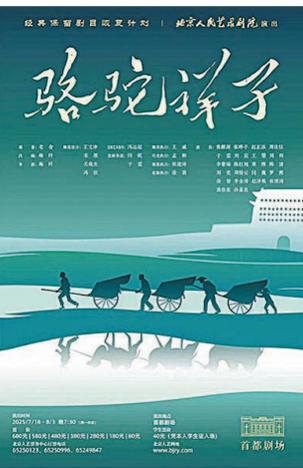
伤痛、风景、装备、成绩、奖牌、心率、轨迹，甚至摔倒后的那一身泥——这些越野跑中的寻常事物，最终指向的早已不是数字、输赢或积分，而是成了一种更深的探索：关于自律的坚持，关于自由的边界，关于自我的找寻。比起名次，我更大的收获是一种内在的“扩容”。山野教给我的，并非如何跑得更快，而是在漫长的上坡路上，学会与自己的喘息和怀疑共处；是在跟跑的下坡途中，找到重心下沉、顺势而为的智慧。它让我确认，自己拥有与困境周旋的韧性，也拥有在狼狽中保持体面的从容。

过去，“力量”“耐力”“坚毅”这类词

语，常被默认为男性的叙事脚本。然而，山野见证着新的叙事。在赛道上，女性参赛者的比例持续攀升，女性的身影也同样闪耀。在站台上，我偶遇了UTMB(环富士山越野越野赛)史上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女子冠军向付召。她的笑容恬淡从容：“越野跑带给我的，是一个更坚定、更沉静的自己。”在她身上，我看见了另一种生命姿态。

暮色四合，终点处的大锅升起了滚滚白烟。猪肉鲜笋馅的饺子在沸水中起伏，红糖姜茶的甜香弥漫在清冷的空气里。我端着一碗滚烫的羊肉汤，看夕阳给馒头山镀上金边。山还是那座山，而我，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

无论是攀登险峻的山峰、穿越广袤的丛林，还是在碧波荡漾的湖面划艇，又或是像我一样在山野中徒步奔跑，越来越多的“她”正在书写自己的故事。从国际竞技舞台到本土山野小径，女性的参与、突破与创造，正成为户外运动最蓬勃的脉搏。我们，正用脚步在旷野中定义属于自己的山脊线，在精神的疆域里，书写无限可能。



《骆驼祥子》(北京人艺2025版)海报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版话剧《骆驼祥子》，被誉为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。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1936年在《宇宙风》杂志连载的同名

## 剧评

# 跨越时空的共鸣

马霞

小说。笔者曾有幸赴首都剧场，观赏2025复刻1957年版《骆驼祥子》话剧演出，不由念及：倘若老舍先生泉下有知，面对这部他自称是“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”的作品，是否会迸发出新的灵感？

小说《骆驼祥子》的结尾，笔者初读并不以为美。故事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，屈指算来，正是百年前的乱世。十八岁的祥子在父母双亡、薄田尽失后进了北平城，靠着拉洋车，在22岁终于如愿以偿，拥有了人生第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。此后他历经三起三落，从一个执着要强、眼里有光的青年一步步走向堕落，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。

由小说《骆驼祥子》改编的话剧、影视剧、京剧、广播剧、歌剧等，均以批判的视角控诉了当时社会

的黑暗。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出品的京剧版《骆驼祥子》中，鼓书艺人唱道：“四方四正京都古城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，百家百姓三六九等，人力车夫活在底层。”

艺术源于生活。对于小说中看似“不美”的结局，我们有必要结合时代背景，理解旧时代人力车夫的真实命运。社会学家李景汉经调研估计，当时北京16岁至50岁的男性中，每六人中就有一人是车夫，人力车夫及其家属约占北京将近20%的人口。这些史料勾勒出旧时代人力车夫群体的生活状况，也是老舍先生创作《骆驼祥子》的现实根基。

而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，尤其是结局的差异化呈现，也恰恰折射出不同时代对这一群体命运的解读与思考。1982年上映的凌子风导演的电影版

《骆驼祥子》，结束于祥子的心上人小福子上吊自杀。1998年首演的京剧版《骆驼祥子》的结尾，在出殡背景下，人车“共舞”，尽显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。2023年底，方旭导演的“全男班”话剧《骆驼祥子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，该版本以老年祥子徒然感叹“一个人抵不过过世”收尾。梅阡导演、改编的1957年北京人艺话剧版，对虎妞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改动，将她作为一个敢作敢为的正面形象来处理。这一版本的结局中，虎妞病逝，祥子被暗示跟随车夫小福子走上革命道路。2007年顾威导演的人艺版，以小福子送别祥子，祥子承诺“混好了回来看她”作结。2025年闰锐、于震联合执导的复刻1957版剧目中，虎妞病逝后，祥子颓然矮下去，掩面叹息“人到底该如何活着”，全剧

## 文苑笔谈

祁阳城东，湘江左岸，万卷书岩壁立如屏。文昌塔坐落其上，青砖垒砌的塔身承载着岁月沉韵。风过处，檐角铜铃轻响，细碎清音穿云渡水，漫过湘江碧波，也漫过我半生的故乡记忆。

少年时代便常常登临文昌塔。多年来，每次返乡，我总要跨过东江桥，走过宝塔街，绕到万卷书岩之上，看看这座塔。多数时日，它被一圈施工围挡包裹，塔门紧闭，只有青灰色的塔身隐约可见。我只能远远望着，凭记忆去摩挲塔中的青石与刻痕。

直至甲辰年清明，再度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，焕然一新的文昌公园在眼前豁然展开。围挡已撤，修缮后的古塔“修旧如旧”，矗立如初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它依然敞开怀抱，容游人登临：塔内的二十六条巷道、五十一道通门、一条死巷、两扇假门皆完好保留。外廓除新增青石护栏以策安全，仍是熟悉的七级八面设计，四面抱厦，璩珠翘角，古意盎然。

在中国众多的文昌塔中，祁阳文昌塔或许不是最宏伟的，却是最独特的。倡建此塔的来溪先生邓球本是理学名臣，万历年（1573年），他于贵州铜仁知府任上挂冠归祁，隐居于湘江东岸梅花洞，潜心研读《周易》，撰著《理学宗旨》等书。或许正是这份浸淫易理的学养，令他在构思建塔时，将八卦流转、方位生克的玄机，悉数凝铸于塔中。塔内无一巷道雷同，又道道相似；无一塔门朝向重复，又各有其用。若不能找准方位，便只能在逼仄的塔内兜兜转转。初登此塔者，多会陷入这循环往复之中，难觅上下之径。

告别故乡三十载，我走向南北，也曾登临不少名楼古塔。它们或有便捷的登塔设施，内里却人声鼎沸，意境全无；或虽仿古建筑形制而建，却只剩同质化的文创商铺。这些名胜，美则美矣，却失去了与身体诚实对话的温度，与历史真实碰触的质感。

而故乡的文昌塔却仍守旧制：青石阶需以足丈量，迷宫需以心破解。塔内无喧嚣的叫卖之声，唯余风铃清响。它不迎合速览的时代，不贩卖便捷的体验，只静候有缘的攀登者。

少时的我，未曾读过《易经》，既不知阴阳之道，亦不谙八卦之理。初次登塔，也曾被这纵横交错的巷道困住。立于塔心，身旁皆为路，却不知路在何方：是进，或是退？是通途，或是迷途？是启程，或是困顿？是前路，或是歧路？是边界，或是另一重天地？

不服输的年纪，想出一个笨办法——面对塔中央的神龛，以左手为起点，一扇门接一扇门试探，一条巷接一条巷穿行。第一层最顺利，转个圈就能发现楼道；到了第二层，难度陡然升级。纵使逐门试探、遍巷穿行，终是徒劳往返。改以右手为始，逆时针再转过每条巷道，仍只能回到中厅的神龛之前。反反复复地寻路，却始终挣不脱这循环的桎梏。

这无力感如此真切，让儿时囫圇吞枣读过的故事，刹那都活了过来。这才恍然大悟，为何陆逊会困于诸葛孔明的石头阵，为何水滸英雄面对祝家庄的盘陀路会一筹莫展，为何药师的桃花岛阵法能令今天下英豪却步——纸上读来，只觉得这些故事是文人夸张的笔法，身临其境时，方知是现实的映照。

几番折腾，心底的傲气渐渐被疲惫取代。一份不甘与茫然，在塔内狭小的空间里蔓延。我转身走出塔门，来到护栏残缺的环廊。江风迎面而来，檐角铜铃随风轻响，清越之声如一泓冷泉，洗透了胸中块垒。抬眼望去，湘江碧波回流，祁山层叠叠嶂，心境也豁然开朗。

信步环廊，目光游移间，忽然瞥见一条向上的石阶，默然隐于一扇寻常门道之内。那一刻，欣喜如江潮漫过心堤。这踏破铁鞋无觅处、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顿悟，远比单纯找到前行的路更令人悸动难忘。

边攀缘边思忖，此前也曾数度走过这环廊，为何始终未见这石阶？或许，站在缺少护栏的外廊，人因惧高，身体本能地紧贴内壁，视线也被牢牢锁死在脚下的方寸之地与廊外的虚空之间，生怕一步失足、万劫不复，哪里还能注意到身旁的通途。

目因于足下三尺之危，路藏于身侧一步之遥——这精妙的空间与心理博弈，绝非偶然。想来当年的匠人，不仅精通砖石建造之术，更深谙人心幽微，方能在敬畏与求索之间，设下这充满哲思的通途。

由此懵懂一悟：多数时候，困住我们的并非困境本身，而是向内纠结、画地为牢的执念。当视线从逼仄的恐惧中抬起，脚步随江风与环廊延展，转机便在开阔处静静等候。学会在无路时转身，在惧高处抬眼，不再困于眼前的方寸之地，答案自会与你不期而遇。

阔别多年再登文昌塔，我发现，二层及以上多了护栏的守护。塔内巷道依旧纵横交错，青石台阶温润如昨，登塔的我，却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。风穿门隙，檐铃清响如故，其声愈沉，如岁月低语。攀至第七层，头顶一面铁门拦路，再也无法像儿时那般，爬到塔顶的铁葫芦之下。那时年少无畏，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。其实心中亦存惶惧，本能地紧贴葫芦基座方得心安，仿佛塔顶那重达十一吨的铸铁巨物，就是唯一的依靠。这份既恐惧又兴奋的心情，依旧清晰鲜活。怅惘之余忽生释然：有些高度，只为少年心气所设；有些边界，恰是岁月馈赠的慈悲。塔未变，变的是登塔人。

感恩这塔，自第一次攀爬之后，《易》云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，便在我心中渐渐明晰。从此，迷宮于我，不再是恐惧的象征。光阴流转，我走过无数现实与心灵的迷宮，每每踟蹰，总忆起故乡文昌塔内青石阶的坚实，与环廊上那一缕吹散迷茫的江风。

登临这塔，得到的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游览经历，更是一份在路上坚持与清醒。巷道延展抉择，石门守护机枢。左转弯死门，右拐见出路；进一步是绝境，退半步是通途。行路难觅走进死巷，生活里总有些无法挽回的选择，但生命的仁慈在于，它总在别处预留了向上的路。这条路，就藏在每一次迷途时的不弃，藏在每一次困顿时的转身，藏在“向内求索”与“向外眺望”的转换之间。正是这些困境和挣扎，教会我们坚守与变通，沉淀与成长，教会我们在迷茫中寻找光明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

# 再登祁阳文昌塔

王琳

王琳